



马 洪 主编

论企业买卖

——改革中的企业兼并
与产权有偿转让

责任编辑：文 夫
封面设计：王 艺
责任校对：徐建华

论企业买卖

——改革中的企业兼并与产权有偿转让

LUNQIYEMAIMAI

马 洪 主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虎坊桥福州馆前街6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8.5印张 212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0册

ISBN 7-80036-060-1/F·45 定价：2.65元

目 录

- 论企业买卖 马 洪 (1)
论企业兼并 孙尚清 (20)
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和所有制的改革 董辅礽 (29)
产权转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 厉以宁 (41)
关于我国中长期经济改革的方向问题 田 源 (57)
保定市企业兼并情况和对几个问题的认识 田福庭 (78)
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 叶金生 张汉生 (101)
企业兼并中的效果意识 郭少英 (145)
兼并是搞活企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孟志辉 (157)
我厂是如何兼并武汉市东方皮鞋厂的 陈方烈 (165)
我们初步尝到了企业兼并的甜头 肖 凡 (178)
对企业兼并几个问题的认识 韩立成 (186)
改革与发展有机结合的好途径 张广琦 马学禄 (197)
企业兼并中的资产评估 王久华 (207)
产权转让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 乔 刚 (236)
企业产权转让与价格改革 任兴洲 (252)
编后 (262)

论企业买卖

——关于企业产权有偿转让的几个问题

马 洪

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今后五年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时，明确提出了要实行企业产权有偿转让，并把它列为深化企业改革的四项重要任务之一。可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并需要我们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叫“企业兼并”，有的叫“企业产权转让”，也有的叫“企业产权有偿转让”。我理解，李鹏总理所讲的企业产权有偿转让，就是指把企业这一生产要素的集合体推进市场，按照商品经济原则进行买卖，即企业买卖。这与过去在传统体制下，单纯靠行政命令实行所谓“关、停、并、转”、调拨、转让企业资产是完全不同的。记得1986年我在上海、杭州等市最初和同志们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曾提出企业可以买卖的问题。我认为，不仅私人企业可以买卖，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也可以相互买卖，中外企业也可相互买卖。这些论点都登在当时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看来尽管在这一问题上有种种不同说法，但还是叫企业买卖好。

企业买卖这一新的改革形式，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据我们初步了解，目前，全国各地几乎都出现了这方面的改革实例。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内外普遍关注。因此，如何认识这一改革中的新事物，探讨它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所具有的意义，对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新经济体制的形成将产生的影响，都是实践向我们提出来的迫切要求。在这里谈几点个人认识。

一、发展企业买卖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客观需要

企业买卖在我国大地上出现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概括地说，它是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它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纵观9年多的经济改革，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我们首先从利益机制入手，先后采取了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步利改税等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增强企业的生机和活力，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都曾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改革的不断深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然而，由于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措施，主要是由政府来搞活企业，它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而财力有限难以为继，因此，这种做法发展余地已经很小。随着两权分离理论的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成为近年来搞活企业的主要措施，它为承包者利用政府和市场所提供的条件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创造了条件，部分解决了企业内部活力和经营机制的问题。但是，企业承包制主要还是解决国家与企业的纵向分配关系，还不能解决资源流动和企业通过横向的发展和扩张增强活力的问题。这就使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下列尖锐矛盾难以解决：一方面，大批经营效益好、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因资金、场地等限制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为数不少的经营不善的亏损企业，却占用大量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不仅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而且每年要耗用各级财政的大量补贴。这种状况制约着国家把有限资金投到急需发展的行业和企业中去，也使为数众多的企业普遍缺乏活力状况难以改变。例如，1987年9月，我和另几位同志曾到北京齿轮总厂调查。该厂是全国58家汽车齿轮制造厂中最大的生产厂家。该厂实力强、效益好，全

国固定资产逾千万元的齿轮厂有13家，而北齿厂年上交税利总额相当于其它12家总和的1.4倍。该厂“七·五”期间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但由于该厂是有27年历史的老厂，原厂区发展受到限制，

“英雄苦于无用武之地”。而朝阳区所属国营金属工艺制品厂，占地42.6亩，厂区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还有水、电设施。但该厂建立十几年来连年亏损，1986年亏损达51万元，每年靠财政补贴，工人只发70%的工资。这种现实的矛盾，迫使人们扩展视野，寻找一种可以同时搞活效益好和经营亏损这两类企业的有效机制，企业买卖便应运而生。在这种机制下，由经营好的企业去购买、兼并经营差的企业，使先进企业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使落后企业起死回生，重新获得生机，如北齿厂购买了金属工艺制品厂的产权，当年就增收了20万元。工艺厂则避免了破产损失，职工也找到了新的出路。

其次，它是促进资产存量合理流动，实现宏观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要求。

经过30多年建设，我国已经具备了8千多亿元的国有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及相应的流动资产），形成了40多万个工交企业，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旧的投资方式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存在弊端，使一部分企业的资产，在投资之初就先天不足，整个社会又缺乏资产存量合理流动和重新组合的有效机制，形成了原有资源滞存的格局，严重阻碍着经济发展和宏观效益的提高。据工业普查部门统计，目前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存量中有三分之一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在原有资源不能流动的情况下，迫使国家只能通过新增投资调整结构。自1978年以来，国家每年支出1千多亿元投资用于新建企业，由于投资机制不合理，一部分投资效益很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有了很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产存量的流动，取得了好的成效。但是由于横向联合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因此，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发生行为短期

化，甚至互相封锁技术、设置障碍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积极探索，找到了企业买卖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资产存量的合理流动，改变原有的投资方式，将资金投向现有企业，引发现有资金存量，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不仅节省了大量建设资金，而且缩短了建设周期，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北京齿轮厂来看，为完成“七·五”规划项目，若走原有扩大再生产的老路，至少需要国家投资2000万元（包括征地、基础设施建设、付给农民款项等等），而购买金属工厂，只用了505万元资金，而且再投入200万元，就能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为扩大生产规模打下了基础。节省了投资，提高了投资效益。

再次，它是改善产业组织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必由之路。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提高宏观经济效
益，这一方面取决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取决于产业组织结
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所谓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是指生产
要素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动态组合方式，它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
题之一。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不尽合理，企业的初
始规模与现存规模虽有变化，但大多是靠外延投资而不是生产要
素流动和重组的结果。我国虽有大、小企业之分，但大都是全能
厂而不是专业厂，大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经济规模相差甚远，小企
业也是求全发展，难以适应专业化协作基础上的规模经济的要求。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986年，我们曾到杭州万向节厂调
查，该厂是优秀农民企业家鲁冠球领导的乡镇企业，生产的汽车
万向节的市场占有率为三分之一，出口产品占全国该产品出口总
量的40%以上。为了扩大生产，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提高规
模经济效益，该厂打算投资扩大再生产。当时的状况是：全国生
产汽车万向节的有24家工厂，生产能力很大，而由于质量不好和
其它原因，设备大量闲置，并且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损。但因为缺

乏生产要素灵活流动的机制，杭州万向节厂无从考虑用新投资去购买现有闲置设备和连年亏损的企业，走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新路。当时鲁冠球设想在萧山县再建一个万向节厂，而光是建设厂房就需要几年时间，而且从全国来看，它显然是一种重复建设。当时我们向他建议，可以通过购买现有生产万向节的企业来扩大生产，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改造亏损企业。他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主意，并马上着手进行研究。这一事例表明，企业买卖可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组织结构，实现规模经济合理化。并有利于组建企业集团和在集团内部形成合理的产业链条。在全社会实现专业化、系列化生产组织结构。

第四，它是我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必然结果。

几年来，在我国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上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以“两权分离”为基础，强化企业的经营组织，实行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相应的推进其它方面的改革；二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顺经济总体运行机制。对这两者单纯强调哪一种都不行。如果不进行企业制度改革，难以使新经济机制运行提供微观基础；而不进行经济总体运行机制的改革，企业制度特别是企业资产经营机制难以彻底转变。因此，从改革与发展的要求来看，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企业买卖正是使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企业买卖与企业破产的关系

七届人大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之后3个月，《企业破产法》将自动生效，从此，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淘汰机制将导致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缺乏竞争淘汰机制，一个企业一旦建立，只要上级主管部门不宣布关或停，无论是亏是盈，都会

安然无恙地存在下去。有的企业从建立之初就一直亏损，几十年过来，已经亏进去几倍于当初的建厂投资和不断追加的资金。但是对这些债台高筑、早已资不抵债的企业，不仅不能淘汰，国家每年还要拿出大量财力补贴亏损，这些企业也心安理得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不思进取，毫无压力。改革以来的种种措施已经震动了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特别是《企业破产法》的制定和实施，将破产提上日程，对这些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产品无销路、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将是必然的归宿。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必然法则，是竞争规律在发生作用。这是保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必然条件。破产法是对债权人利益的维护；对债务人则是“置其于死地而后生”。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企业破产制度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应看到，破产制度与其它改革措施相比，带来的社会震荡比较大，而且破产制度的实行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从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安定出发，对破产企业的职工重新就业之前要发放生活救济金，这就需要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二是失业的职工要重新就业，找到适当的工作，这就要求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需要劳务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条件看，这两个条件虽然已经开始起步，但远没有建成和完善，因此在破产法实施初期，不是难于实施破产，就是难免造成社会震荡，使改革难于大面积推行。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买卖提供了一条比较顺当的途径，即：在一个企业没有彻底破产之前，就将其转卖出去，因为一个企业达到资不抵债的处境，往往有一个过程。当一个公营企业连年亏损，产品无销路，无力转产或创新的情况下，就应将其转卖出去，以取得相当的货币资产去扶持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发展生产。这种做法的好处起码有三点：其一，救活了濒于破产的企业，给他们以新生之路。因为宣告企业破产不是目的，目的是搞活亏损企业，而在其它搞活方法不能奏效时，出售企业产权，是这类

企业起死回生的最好选择。实践证明，这类企业通过买卖多数都获得了新生；其二，避免了破产损失，盘活了长期呆滞的资金。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偿，虽然能够收回部分资金，但在债务的回收上，债权人的利益要有一定的损失。例如，沈阳市防爆器材厂破产后进行了债务处理，人民银行沈阳市皇姑区办事处贷出的2.1万元资金只能收回一半，银行遭受了损失。而目前已经发生的企业买卖实例则均以买方企业承担卖方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为条件，这样就使亏损企业拖欠的资金得以偿还，使长期呆滞的资金，变为现实可用的财富；其三，避免了一批工人失业。目前的企业买卖多数是由买方企业全部接收卖方企业职工，这避免了企业破产带来的一部分工人失业造成的社会震荡。当然，从长远来看，买方企业从追求经济效率出发，很可能会拒绝全部接收卖方的职工，这是符合优胜劣汰和竞争规律要求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买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给其他企业和职工以更大的竞争压力。但这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能及时跟上，给职工更多的选择职业和自由流动的机会，并对失业人员给予必要的社会救济，以减少改革中的阻力。

必须明确，企业买卖虽然能减少部分企业破产，但不能代替企业破产制度，对长期资不抵债又无人收购的企业必须宣告其破产，促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践中应防止过多地采取先破产、冲销部分债务，以降低资产有偿转让价格的做法。

企业买卖与其它的改革相比，有其独特的作用，但并非包医百病的良方，它不能代替其它改革形式，而应与之互相配合运用，在改革与发展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在当前广泛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中，产权有偿转让应与承包制相结合，宜包则包，宜有偿转让则有偿转让，先包后转或先转后包，决策的标准是看哪种方式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应提倡企业承包企业的方式，使企业经营权在全社会范围内作合理的转移。例如，保定市具有雄

厚经济实力和技术管理优势的国营604厂承包了板纸厂，由承包厂派驻新的法人代表，把经营权转移到604厂，把一个即将倒闭的企业挽救过来，进而又以板纸厂为主体，购买了永华餐巾纸厂的产权，实现了辐射式企业买卖。企业产权有偿转让还应与横向经济联合配合运用，在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挖掘现有生产力，实现全社会范围的内涵扩大再生产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总之，各项改革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改革方式，促进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

三、企业买卖的近远期效应

企业买卖对于改革和发展有着积极效应。这可以从近远期两个不同角度加以考察。从近期效应看：

1. 有利于救活现有亏损企业，使生产要素向具有经营优势的企业家手里集中，迅速提高经济效益。1986年，我国国营工业企业亏损达6479户，亏损额达47亿元，1987年亏损额也有40亿元左右。这些亏损企业中为数不少的企业属于经营性亏损，如何救活这些企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保定等地的做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经过4年多产权有偿转让的实践，保定市目前已有13家企业购买了14家企业的产权，从而使全市经济效益迅速提高。1982年市属预算内工业企业49%的亏损面和1696万元亏损额，到1987年当年全部消灭了国营企业的经营性亏损，全市财政收入比1982年增长1.39倍。5年翻了一番以上。青岛市在承包中引入兼并机制，也收到明显的经济效果，1987年全市亏损户减少40%，亏损额下降74.2%。如果把保定市和青岛市的经验推广至全国，那么每年国家将不仅减少几十亿元的亏损补贴金额，而且将大量闲置资金动用起来，使宏观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在救活亏损企业的同时，使生产要素以企业买卖方式向具有经营优势的企业和经营者手里集中，同是那些要素，同是那些职工，但在新的管理方式和先进的

企业文化下重新组合，就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资产产出率迅速提高。据保定市13家企业买卖的资料统计，买方企业盈利总额与卖方企业亏损总额相抵后，增收1030万元，比买卖前提高了223%，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2. 有利于盘活长期呆滞的资金，使有限资金带来更多的效益。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制约条件之一是资金不足，而有限资金的利用率却很低下，其中一部分资金和贷款由于企业长期亏损和濒临破产而难以偿还，成为呆滞资金，降低了资金周转效益。例如，武汉市在没有实行企业买卖之前，仅工业企业过期未还的贷款就有2.546亿元，企业间相互拖欠高达10亿元。企业买卖为消除这种现象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在有偿转让中，买方企业承担卖方的债务，使金融部门能够如数收回贷款，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的债权债务也得到落实。据武汉市金融部门统计，在转让过程中，各专业银行收回的过期贷款和企业相互落实的债权债务已达数千万元。从而把长期沉淀的资金变为现实可用的要素，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3. 有利于搞活存量资产，改变增量投资方式，提高投资的效益。通过企业买卖，使现有大量闲置或利用效率很低的资产流动起来，得到充分利用，按现有固定资产和相应的流动资金估算，若将其中1/3的部分搞活，其潜在效益就相当于“六·五”期间国家全部生产性基建投资，会大大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同时，存量的流动会促进增量的革命，改变现有投资方式，使新增投资尽量投向现有企业，发掘已有的社会生产力，逐步减少重复建设，有效抑制投资膨胀，改善投资结构。这也是我国经济由粗放经营到集约化经营的重要途径。

4. 有利于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促进整个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作为生产要素集合体的企业成为交易对象，进入市场，会带动各类要素的市场尽快发育和形成，资金市场、劳务市场、地产市场等都会随着企业买卖的发展更快地发育

和建立起来，并将促进整个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5. 有利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对于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利用世界市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在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中，企业买卖能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海南、福建等沿海省份都明确提出允许国外资本来本省购买企业，这是很明智的做法。允许外国人购买企业，可以带来资金和技术以及国外的销售网，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提倡内地资金到沿海地区购买企业。沿海地区等开放省份，享有许多优惠政策，又具备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的有利地理条件，这些地区转让一部分亏损和微利企业给其它地区，实际上是将对外开放的机会和优惠政策变成了财富，将会吸引大量内地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到沿海地区购买企业，这样，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可以大量引进内资，一方面加快了沿海地区外引内联的步伐，另一方面使这些地区真正成为全国可以利用的窗口，内地企业也能够得到“间接开放”的收益，真正使沿海带动内地，加快全国的发展步伐。另外，在对外开放中，还应提倡国内资金到国外购买企业，发展海外投资，这样可以直接利用国外的原材料、技术和国际市场，打破贸易和关税壁垒，更有利于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企业买卖的远期效应主要是：

第一，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其深刻意义在于改变了公有资产的运行机制，通开了资产存量和流量之间的界限，增强了国有资产的选择性，使不同的国有经济主体所拥有的资金能够流向资金产出率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使实物资产向经营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集中，有利于改变我国现存的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为社会经济总量平衡创造相应的结构性基础：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从而成为使改革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例如，武汉市处于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发展流通业、服务业其效益颇为可观。但原来武汉

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因资金等条件不足受到很大限制，企业买卖使这种局面大大改观了。1986年以来，武汉市有十多家企业通过买卖向第三产业转移，几家大型商场因此得以发展，为增强武汉中心城市的流通功能创造了条件，改善了行业结构。

第二，是产权制度改革的启动机制。企业买卖、产权有偿转让的前提是企业财产关系的明确化。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企业财产分级管理，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企业买卖的发展将会促使各级政府以资产所有者身份来经营所属产权，并逐步建立起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和多元经营主体。这是实行企业买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这种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要负责管好自己所管的资产使之不受损失，不仅要保值，而且要增值。这里就有一个经营问题，为使所经营的资产迅速增值，或购买企业，把货币资产变为实物资产，或卖出企业，将实物资产变为货币资产，并将资金投向更有利可图、社会效益更好的企业、行业和部门。这样就将政府管理企业生产的职能转变为经营产权，有利于国有资产不断增值，宏观效益不断提高，而且为政府的职能转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它有利于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发挥作用。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从中长期看，国家调节市场，包括调节企业产权买卖市场，国家根据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要求，对产权有偿转让中的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地区结构进行宏观调节，通过制定方针、政策、法规，使企业买卖朝着有利于优化结构、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方向发展。宏观调控下的企业买卖，能够引导企业资产向优势企业集中，引导资源存量更合理地流动和重组，使新经济运行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它有助于形成较硬的企业预算约束机制。预算约束软化，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以往行为的主要特征，这是由旧的经济

体制模式决定的，改革以来，虽然采取多种措施力图把企业塑造成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但实践证明，在原有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下，企业不能自负其盈，更不可能自负其亏。目前实行的经营承包责任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的选择是通过企业买卖、产权有偿转让的发展来促进产权关系的界定，并在同一所有权下形成若干产权经营主体，各主体之间进行企业化产权经营并展开竞争，胜者，资产将不断增殖；败者，资产逐步减少以至破产。这样就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约束。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买卖也给企业经营者以较大压力，迫使其不断追求新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否则将被效益好的企业兼并。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较硬的企业预算约束机制，造就大批精明能干的企业家，创立新经济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微观基础，使整个经济运行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总之，无论从近远期来看，企业买卖都显示了深化经济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的良好前景，在改革和发展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积极支持和推动这一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健康发展。

四、企业买卖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企业买卖或兼并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这是一种传统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因此，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必然展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在竞争中，尔虞我诈、不择手段地打击以至吞并竞争对手，一举实现消灭竞争对手，发展自己的目的。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企业之间互相倾轧、互相吞

并，从而导致经济波动和工人大批失业的历史，企业兼并的后果是使资本主义从竞争走向垄断，而垄断竞争，窒息了企业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因，因此，垄断代表了腐朽，等等。

这种传统的看法有其正确的一面，即它比较清楚地揭示了企业买卖或兼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消极方面。但是，简单地否定企业买卖或兼并的积极作用，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东西，没有认识到它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要求，则是传统看法的缺陷。实际上，企业买卖也有积极的作用，它不是某一社会形态所固有的东西，而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手段。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买卖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在竞争性的市场运行过程中，企业之间通过实力较量而出现重组和兼并，产品无销路、创新能力弱、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被淘汰；有发展前途、技术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则得以存在和发展，这种机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企业买卖的另一作用是使整个社会的资产不断处于一种发展变化的状态，它对于资产存量的重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不断调整、不断趋于动态优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史上，它也起着一种治病的作用，几乎每一次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规模经济的演变，都伴随着企业兼并浪潮的出现。换言之，每次大的企业兼并浪潮之后，都会出现新的更合理的产业结构格局和新的企业生产组织规模。

例如，在美国的产业发展史上，就曾发生过三次大的企业兼并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895~1905年“世纪之交”时期，以从事同一产品生产或同种产品经营的企业之间的横向兼并为特征的兼并浪潮，导致了美国钢铁公司、美国制造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等规模较大公司的出现。这些大公司在市场占有率上都占有压倒的优势，从而使原有的比较分散的经济具有了规模效益。第二

次，发生在1929年，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的开发利用迅速向电力转换，导致了电力部门内部的兼并大量增加。这一时期，企业之间的纵向兼并成为主要特征，食品、化学、金属等工业企业之间的兼并增多，形成了系列化的联合生产企业。发生于1950～1969年的第三次兼并浪潮的最大特征是复合式兼并成为主流，形成了复合式经营方式，从而使多种经营管理学发展起来。战后，即使在垄断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兼并也一直存在。进入八十年代后，对高技术领域进行技术开发已经成为企业关心的主要课题，为了获得必需的技术而进行的资产的收买增加了。同时，卖掉经营不景气的资产，买进大有发展前途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重新调整经营结构，也是企业兼并的主要目的。不仅美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企业买卖和兼并的浪潮，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伴随着企业买卖和兼并，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日本以市场扩大型为主要内容的复合式兼并比例增高，1980年达到30.3%，反映了日本经济发展中企业经营的集中化、系列化的动向。

可见，企业买卖和兼并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可以说，如果没有企业买卖和兼并这种生产要素整体流动机制的存在，商品经济就不可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也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把竞争机制和企业兼并机制视为异端。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资本家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兼并，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已归全体人民所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在公有制下不会出现竞争，只有友好的竞赛，更不可能出现企业之间优胜劣汰的兼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而是产品经济，经济结构的调整都是根据国家计划进行的，即使需要调整，也应该通过计划手段来解决，而不允许企业买卖等市场机制“插手”其间。